

诗词论析

续集

张志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

8

诗词论析

续 集

张志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诗词论析

(续集)

张志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插页2·字数144,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统一书号: 10093·336

定价: 0.85 元

目 录

试论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	1
阶级斗争推动文学发展的史实考察一例	
——试论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歌和唐代文人诗歌在反映劳动人民 生活上的重要区别	
.....	18
鲍照及其诗新探	35
试论关于杜甫的评价问题	52
杜甫青年时期的游历生活是理解杜诗发展过程的 重要环节之一	73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初步体会	
——以鲁迅论诗的话为印证，略论中国诗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	81
论宋诗	90
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10
说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	120
试论关于杜甫《秋兴八首》的评价问题	128
说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140
说杜甫《武侯庙》	149
说王安石的《读史》七律	157

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兼谈对苏轼豪放词风 的理解	165
说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 作此篇，兼怀子由》词，再谈对苏轼豪放词风的 理解	181
说陆游《卜算子·咏梅》词，兼论封建时代爱国主义 诗歌的评价问题	195
元好问《论诗绝句》第十首平议	210

试论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

在“四人帮”干扰以前，关于屈原政治思想的讨论，一般认为主要来源于儒家，但也受到法家的某些影响。“四人帮”别有用，以“儒法斗争”为标榜，用来作为衡量历史人物是进步还是反动与落后的唯一尺度，在学术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屈原也就被划在法家之列。“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们在学术上散布的种种恶劣影响，必须彻底批判，予以澄清，但我们还必须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讨，取得进一步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作家，影响极为深远。我们要了解屈原的作品，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就应该首先对屈原的时代、生活道路，特别是政治思想的来源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掌握。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古史的材料虽然缺乏，但我们只要认真研讨，多方印证，总是可以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来的。而要这样做，必然要牵涉到对时代的看法，牵涉到儒家和法家的发生、发展问题，牵涉到秦、楚统一的成功与失败的问题。因此，对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历史学领域内的重要课题。

—

关于屈原的政治思想来源于儒家，前人已经有明确的论述。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说：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舜，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

将覈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很明显，司马迁和刘勰的话，都是根据儒家学说的道德标准来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论述和评价的，又都可以从“离骚”中得到印证，而“离骚”又是最足以代表屈原政治思想的作品。因此，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里只引司马迁和刘勰的两段话，也就足够作为有力的论证。此外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而就“离骚”的字句来细加比附，也还可以增加不少的例证；但问题既然已经可以说明，也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持屈原是法家或主要受法家影响的同志主要的根据是《惜往

日》里面的一些话：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

特别是：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汜淝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在这个基础上，证以《离骚》中批评当时政治风气的话：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更证以《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造为宪令”的话，从而得出屈原确实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法家的结论，这似乎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问题在于：

(1) 古今来许多论者都怀疑《惜往日》不是屈原的作品，所持的理由是比较有力量的。例如《惜往日》中自称为“贞臣”，而称楚王为“壅君”，都不是屈原应有的口吻，与《离骚》相比较为不类。又如“心治”的用法，只见于韩非子，确是法家的术语；但那已是发展了的晚期的法家，而不是屈原时代所宜有，从《离骚》中也找

不到来龙去脉。对以上两个问题，持屈原是法家论点的同志也曾作过一些解释；但都不可能明确地解决问题。而如果把《惜往日》看作楚人后于屈原而同情屈原者的作品，则都可以顺理成章，得到确切而合理的说明。

(2) 说屈原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并不排斥屈原的政治主张在某些方面具有革新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还要作比较落实的论述）。不仅《离骚》里面有关政治态度的表现都可以概括进去；就是联系司马迁《屈原列传》的记载，也仍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而如果说屈原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家，就很难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所表现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解释得合情合理，这只要就上文引证的司马迁和刘勰的两段话来考虑，就可以得到说明，而不必费更多的笔墨来论述了。

如上所述，我们只要从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联系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来进行全面的考察，是很容易得出：屈原的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而不是法家。

二

论证了屈原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还远没有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这一论点，对屈原的政治思想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评价。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考察：在屈原的时代，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应该如何来分析评价？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观点，则儒家必然是反动、落后的，而法家则必然是进步的。甚至推论到儒家是卖国的，而法家则是爱国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屈原划归法家，实在是势有必至了。“四人帮”的观点自然是荒谬的，已

经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但要结合屈原的具体情况，来论证屈原究应属于儒家或法家，从根本上进行研讨，并作出评价，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

(1)、关于古代历史分期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封建时代的上限定在什么时候，论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一时还很难作出结论来。这就不可避免地有关时代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增加不少的困难。

(2)、关于儒、墨、道、法等学术流派的发生、发展，以及关于屈原的政治活动和当时楚国内部的政治情况，资料都非常缺乏，远不足以确切地说明问题。这就在问题的论证上深深感到材料不足的困难。

以上两种情况又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上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论证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并作出评价，一方面固然要尽量掌握有关的资料，希望能发现一些新的资料或对资料作出一些新的解释；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大处着眼，比较广泛地联系一些看似距离很远的资料，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经过比较具体的分析综合，作出符合或接近历史实际的有力推断来。就前一种方式来说，许多研究屈原的论者都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由于资料的限制，进展不大；就后一种方式来说，这样做的人比较少，路子似乎稍宽一些。本文就是在前一方式的基础上，试图较多地运用后一种方式来进行研讨，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我们还是从孔子说起吧！关于孔子的评价问题，发表过许多文章，牵涉的方面很广，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图去作全面的衡量。我只想指出一点：孔子是在从官学转变到私学的过程中出现的第

一个有名的大师，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一事件的本身只能是春秋时期社会激剧变革所推动的结果。我们知道：官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而私学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就孔子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没落了的贵族子弟。他的弟子中，贵族子弟很少，而非贵族子弟却比较多，乃至有出身于“贱人”的家庭的（如冉雍）。这些情况是官学时代所不可想像的。孔子“述而不作”，当然是继承了官学的教材；但孔子既然是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学者，他就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在他的解释也就是“述”的过程中，必然要有相应的反映。下面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1. 《孟子·梁惠王篇》中说：

仲尼有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近日评论孔子的文章，多举此以说明孔子思想的进步性，我认为符合实际的。以人殉葬的习惯，是奴隶主贵族不把奴隶看作人的突出表现。这种习惯到孔子的时代犹有残存，孔子痛恨这种现象，乃至对“始作俑者”也给以深刻的批判，具有惩前毖后的现实意义。殉葬制之得以废除，自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在劳动中的作用，以及奴隶的反抗斗争的结果；孔子的话也可能是从剥削劳动力的意图出发，但毕竟是顺应了社会变革，这样鲜明的重视人的主张，在孔子以前是没有的。

2. 岑仲勉先生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一文中（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周文史论丛》），根据《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细加剖析，对“天下之通丧也”这句话的“真意”，认为这“是学说，非事

实；是孔子主张应当这样普遍行，并不是说世人已经这样行。”论证得很精确。文中又说：

孔子那句话（指“天下之通丧也”）的意思，直接的是用来打破丧期长短的等级分别，间接的则借此可以打破当日的等级制度，其效果非同小可哩！

尽管我们也可以认为：孔子推行孝道的用意，是意图进一步来控制 and 束缚人民的思想，但就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况及其客观意义来说，仍不能说不是进步的。

以上有关孔子的一些评析，基本上可以不受到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而同时，在问题的理解上似乎也不容易发生歧义。尽管这些评析还不全不备，但总可以窥见一斑，而且也不能说是不重要的。因此，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确定的说，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是有其进步性的一面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既然确有它的进步性的一面，那末，用落后或反动来概括当时的儒家，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再简单地谈谈孟子，有关孟子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这里只提出两点：

1. 《孟子·梁惠王篇》记孟子和梁襄王的对话（节录）：

（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孟子）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从上文节录的对话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孟子是主张大一统的。这在当时是较早提出这种主张的，而且态度非常坚定。

2. 《孟子·梁惠王篇》记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节录)：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率兽食人”，对统治者的揭发和讽刺，非常尖锐，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即本于此。

以上两点又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于孟子的仁政思想。

尽管孟子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的思想，在当时有点迂阔而不适于实行，但针对当时诸侯兼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大一统的思想表现得既明确而又坚定，更应该予以肯定。尽管我们对孟子那些关心人民疾苦的话，也可以认为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两种手法之一；但我们如果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应该承认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孟子是后于孔子一百多年的儒家大师，大一统的思想显然是随着时代的激剧变化而产生的；同时，孟子的那种关心人民疾苦的言论，乃至形成比较系统的“保民”学说，也可以说是继承了上

文孔子重视人的思想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就说明：儒家学派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所发展的，而基于这一点，也就显然不能用落后或反动去概括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

关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学说，当然也有需要予以批判的，但因为不是本文的侧重点，所以没有必要作详细的论述。

法家作为学派来说，比儒家要晚得多，但从它的起源来研讨，则《汉书·艺文志》以为“盖出于理官”的话，也比较符合常情。儒家以政、教为中心，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传授了王官的旧典。理官职掌周王朝的刑法，和政、教有密切的联系，儒家也不能不有所掌握；因此，儒家在主张德治的基础上，也并不排斥刑和法；而愈到后来，就愈有相需为用的趋势。这从战国末年的儒家大师荀子来说，可以说以儒为主而融有较多的法家精神；而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则都转入法家。其中消息，是不难参证的。就是以孔子来说，他对春秋时期具有某些法家色彩的大政治家管仲和子产，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有所批评，但总的评价仍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我们在辨析当时一个政治家的思想或一种学说的面貌，必须根据时代发展情况，分清主次，来作全面的考察。指出这一点，对我们论证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是十分必要的。

三

上文我们就儒家的发生发展，如何评价，以及儒、法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述，这就有利于我们结合屈原以前的楚国的政治情况和文化情况，来作进一步的考察。

屈原在《离骚》中曾这样说：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又说：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这是屈原表白自己的志愿：要抓紧时间，为国驰驱。为了不使国事失败，不惜个人的牺牲。于是努力奔走，希望能赶上前王的步伐。这里的“前王”，一般认为是指上文曾说到的“三后”和“尧舜”，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总觉得泛一些。而且就“踵武”的字义来体会，应该是距离屈原不太远的君王，才能加强亲切的感受。按这个标准来进行考虑，我认为“前王”是指楚悼王来说的。理由是：

1. 自楚悼王的死到屈原政治活动开始的时候 不过六十年左右，父老相传的遗闻轶事，可以说记忆犹新。

2. 楚悼王是一位有能力的明君，他在死前的几年内，任用吴起，变法图强，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3. 楚悼王刚死，反动的贵族发动军事政变，把吴起杀了，又恢复了原来的腐朽统治，而楚国由此又一蹶不振。

从当时的情况来推断，楚国的人民自然会怀念楚悼王，特别是当屈原要从事政治改革的时候，就更能引起他对楚悼王的怀念，从而表示要继承“前王”的事业，踏着“前王”的步伐前进，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心情吗？

屈原怀念楚悼王，而吴起是当时的令尹，是当时楚国变革事业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楚悼王的业绩，就建立在对吴起的选拔和信任上。因此，屈原对楚悼王业绩的怀念，实质上便不能不和吴起发生密切的关联，我们也就有必要进一步对有关吴起的行事作一些必要的探讨。

关于吴起的行事，资料也很少。散见于战国和秦、汉间人著述中的，都很零碎，而且往往有不少讹误（这也是先秦史料中的一般现象）。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篇《述吴起》的论文（见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青铜时代》），旁征博引，并加以考证和推断，使之联贯起来，给我们以很大的方便。为节省篇幅，也为了条理清晰起见，本文只打算就郭文已经整理出来的结论性的推断，来给吴起勾画出一个简单而比较明确的轮廓，从而便于引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至于有关论证的原材料，就不多加征引，读者在必要时，只要参考郭文，也就不难解决了。

根据一些古书的记载，吴起曾经师事过子夏和曾子的儿子曾申，从时代上说是可能的。这就师承上来说，吴起是出自儒家；更重要的是：吴起有些言论，只能用儒家学说来给以解释，如司马迁的《吴起列传》和《战国策·魏策》都载有吴起在西河和魏武侯讨论“河山之险”的问题，吴起的结论是“在德不在险”。又如《荀子·尧问篇》载有吴起引楚庄王的一段话来讽谏魏武侯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话：“诸侯自以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吴起这两次的论点，都很明显的是本于儒家的学说。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切地得出吴起是属于儒家的结论来。

郭先生又根据谈到关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许多零星的记载，用自己的话归纳为以下的内容：

1. 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2. 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3. 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4. 屏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5. 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就这些内容来说，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中有些是孔子早已注意到的，有许多也是随着时代激剧变化而发展的儒家学说所能够容纳得了的。因此，郭先生对吴起作出如下的结论：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施設，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

郭先生的论断，是经过细密的考证分析得出来的，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就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身死而法废，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身死而法不废来作比较，固然是因为楚悼王死得太早，吴起做令尹的时间太短，而秦孝公死得很晚，商鞅做相国达二十年的缘故；但其中似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探索。

首先要说的是，儒家从事政治变革的主张和措施，由于旧思想系统的影响，不如法家的激进，改良的色彩比较浓厚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商鞅的死是因为以前得罪了太子（秦惠王），太子即位后把他处死的，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变。吴起的死则是贵族旧